

只道真情易写

□刘醒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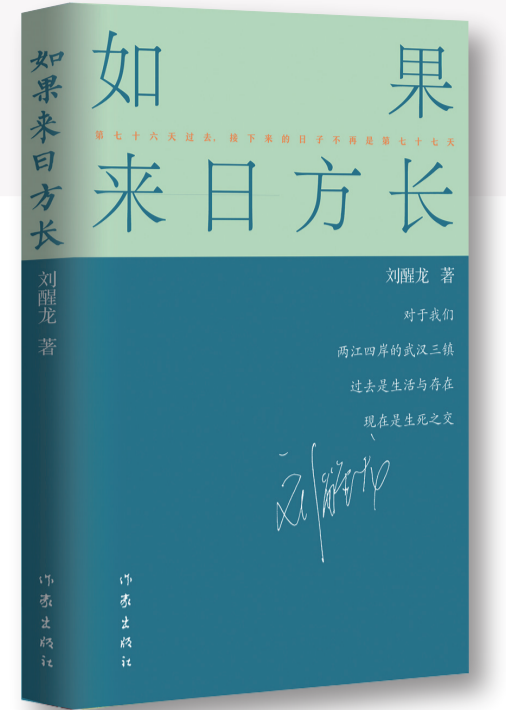
陆游说,只道真情易写,哪知怨句难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前几天,自己的经历,现在想来心惊肉跳,将来还会心惊肉跳。在心惊肉跳中,有两段稍显特别的经历,也让自己对人间何为真情,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也对陆游的佳句有了自身的体会。自媒体出现之前,新闻报道用“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开头,一定是国际时事。凡是内政内务,都必须有清晰的来源,最大限度地杜绝来历不明的消息,避免出现假新闻误导公众。相比那些煽情的“酸爽言语”,权威媒体发布的权威消息要稳妥许多。当然,新闻的即时性特征可能顾后,无法瞻前。再怎么努力,也只是尽量少犯错,不可能不犯错。正常人不当羡慕那种有着猫耳朵的八面玲珑人,有着警犬鼻子的绝顶聪明者,有着黑白通吃左右逢源本领的老江湖。某些人从特殊渠道得到真假难辨的消息,提前准备预案,抢先规划下个动作,占些小便宜的事时常有之,吃大亏的也不在少数。比如炒股,太多听到“内部消息”提前布局某只股票的人,结果都被弄得血本无归,真正靠建“老鼠仓”赚大钱的,从来不是那些整天盯着大盘的平常之人。从普通人或者干脆称为弱势群体的人的角度上看,“酸爽言语”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平。武汉是座大城市,平时习惯说有1300万人口,关闭离汉通道之初,将放假的大学生,返乡的打工者,还有提前回老家过年的那些人去除后,说是留在城里的还有900万人。大数据起作用后,这个数字又变成1100万左右。对于武汉,人口统计是一道大的难题,仅仅每天途经此地、去往东西西北的过客就有200万人。

在地理上,两条江穿城而过,将城市划成事实上的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又因10座(马上就要变成11座)跨长江而过的长江大桥,两条穿长江而过的长江隧道,6座(马上就要变成9座)跨汉江而过的汉江大桥,被逐渐形成的出行习惯再次分割成许多区块,说是人在武汉,其实就只在汉口、汉阳或武昌的某个角落,除非有必要,通常情况下,能不跨界过江尽量不跨界过江。说是大城市,那种盛行酸爽言语的小地方遗风还在。武汉管控措施解除之后,都会发出劫后余生的慨叹。得幸政府,得幸中国共产党,得幸全国人民,反过来看,同样可以说得幸武汉,得幸1000多万武汉人!所幸没有出现万一中的万一,只有一千万个胜利!

过于重磅的消息,既不酸,也不爽,流传范围反而有限。所以,一般说来,酸爽言语没

什么大不了,多数是为了逞口舌之快。元旦之前去见老母亲,请示春节如何安排,她就拉着手说了我们家的一件事,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以她的年岁从不与外面接触,脑子里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在武汉都没有耳闻的东西,想来只能是人生最后阶段,那些分管思维的神经不好使了。所谓酸爽言语,同样没什么大不了。有人活出的品性就是那样,人叫不应,鬼叫飞跑,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钻草丛,草从不走爬地洞。怕就怕假装是茶余饭后有口无心的“酸爽”,其实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假装“酸爽”,常见于恶人攻击。用得最多,用得最熟练,用得最无耻的是国际政治中的舆论战,从2019年针对香港,到2020年针对武汉,一次比一次恶毒,一次比一次疯狂。“新冠肺炎”这个名词还没出现之前的那些相关消息,绝大多数传播者只是为了传播而传播,说不上是听信还是不听信。市中心医院的一位球迷医生,选择了相信,在医院足球队里奉劝同行们不要聚集搞什么“一周一练”,因为别人都不信,他愤而退群,就是很典型的事例。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和个人早有抗击“非典”的经验在握,再厉害的传染病,总不至于超过“非典”吧!只记得天外有天,山外有山,高手之上还有高手,也就这么一点点大意,就忘记了还须防范,恶毒之上,没有最恶毒,只有更恶毒!像我这样向来对医生敬而远之的人,对关闭离汉通道前后关于医院的事情,除了心惊肉跳的后怕,最是觉得对不起陪着我上蹿下跳的那位年轻的同事。关闭离汉通道后十几天,对多数同事我都问过“你还好吧”,就是害怕问他。直到2月8号,算起来最长14天潜伏期过去,才小心翼翼地给他发了一条微信:“你家情况还好吧?”他马上回我:“谢谢关心,家人目前都还好。已经半月没出门了。小区上周确诊了三例后开始封闭管理。我们正在请求社区协助买点菜和药品。您最近也千万不要出门了,外面太危险了。”自己这才说:“那我就放心了,特别后怕,不该带你去医院!”也是因为这事,武汉解禁前后,一般人也可以做核酸检测时,一帮同事集体做过,包括那位年轻同事在内,所有人的核酸三项全部为阴性,才终于放下心来。去市一医院看眼科,是元月13日下午在省政协全会分组讨论会时请假下来回的。追溯起来,2019年夏天去山西平顺县西沟乡川底村,也就是《三里湾》中的三里湾时,眼睛就出毛病了。站在赵树理住过的窑洞前,抬头看

黄土崖顶,有些眩晕。当时大意了,以为是眼睛老花度数加深。回武汉后,还去紧邻协和医院的一家眼镜店,配了一副价格有些“土豪”的多焦点眼镜。国庆节过后,参加一个画展,与一家民营眼科医院的投资人相识后,当即去她那里,见识全武汉市最新的一种仪器。那台仪器的检测结论是保证我的眼底10年之内没有任何问题,当时还挺开心。元月11号上午,省政协全会开幕前半小时,被安排走委员通道。面对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居然没有一个看清晰了。之后几天,眼眶明显红肿。13号那天下午,同为省政协常委的一位同事在会上请假看病,自己也跟着请了假。14号上午,进到市一医院,还没弄清楚情况,就接连被两位年轻人撞了个满怀。细看之下,那人山人海的阵势形同电视新闻里的难民潮。在人海中穿来穿去好几遍,记不清自己撞了几次别人,别人撞了几次自己,昏头昏脑的连排队挂号的地方都找不准。关闭离汉通道之后,关于新冠肺炎的文字多起来,才知道那几天的医院门诊是交叉感染的高发期。好不容易找到与就诊卡对应的窗口,那地方已有一长排老态龙钟的男女。人还没有站定,不是一声,也不是两声,而是一连串的咳嗽声扑面而来,躲不能躲,退无可退,更没有去想去医院来怎么就不戴上口罩呢?能做的事只有与身后的人打个招呼,假装打电话,去人少的地方待上一阵,再回来排队,再去一旁打电话,再回来排队,来回折腾几次,总算挂上号了。那天上午,整个医院就数看眼科的人少,等了两小时,一位副主任医师接诊后,用一根小棒在我眼前晃动几下,她自己先吓了一跳,说你的眼睛怎么样了?你自己怎么没发现?人可以看清楚自己想看的东,却看不清自己的眼睛,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得知眼疾相当复杂后,自己心情相当复杂地与眼科医生说了这句话。因为要做各种检查,在市一医院各个楼层来回跑了个够。再回到眼科医生那里,她明确告知,自己的专长是看青光眼。我马上说,就是担心患青光眼。她也马上回应,说你的情况比青光眼复杂多了。她大概能判断是哪方面的问题,而这类眼疾,只有协和医院眼科姜教授看得最好。这天是夫人的生日,自己本不想扫她的兴,可我们的习惯,凡是有事,基本上是不能过夜的。回家后还是忍不住说了。夫人二话没说,上协和医院网站一查,近几天的号都没有了,只挂上了19日下午眼科姜教授的专家号。省政



协全会于元月10日报到。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除了政协开幕早一天,人大闭幕晚一天,中间的时间完全重叠。在汇聚全省精英的“两会”上,代表与委员们无不为全省近两年社会生活的巨大进步而欣喜,私下里有人偶尔提及华南海鲜市场那事,也就说说而已。知道的人只知道有种新型病毒出现,内心心里从没去想,不久之后就会酿成一场大灾难。可以说,元月中旬以前,全世界70多亿人中,包括最早发现这种病毒的那几位医生,都不曾有对对这种病毒大流行的过分担心与惊慌。像我这样病毒知识为零的人,实在是连参与这个话题的兴趣都没有。元月15日,省政协全会散会后,自己的眼疾似乎更重了些。于是想起协和医院唯一认识的葛医生,就试着与她联系,说明相关情况。经过小葛医生的沟通,姜教授同意在17日限定的专家号之后再追加一个。武汉解禁前一个星期,4月1日,市内交通开始恢复,由于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天下午4点,太阳非常之好,自己突然脱口问女儿,想不想沿着武汉内环转一圈?此话既出就收不回来,一家人马上开车出门,沿内环绕城一周,凡遇到红灯停车时,车上的我们就会开心地笑个不停。还有意在绿灯显示还有几秒钟时,放慢车速等着红灯出现,好将车停在路口,然后像做了坏事那样相互对视着怪笑。唯独车过协和医院正门时,感觉有点恍若隔世。当初来这里看眼科,坐着楼梯一层层爬,修电梯的工人席地而坐的样子,一点也没忘记。更没有忘记进门诊大楼时,一个女人用手撩起挡风的塑料门帘,迎面送来一通连珠炮般的咳嗽。在六楼眼

科候诊时,一位一点也不显老的奶奶,抱着出生才几天的婴儿,在旁边晃来晃去。自己就想这么小的孩子眼睛都没睁开,怎么会有眼病呢?问过才知,是来做新生儿疾病筛查。还有在核磁共振室候诊时,一名穿警察制服的男子不停地盯着我看。自己比对方先进检查室,用的时间比较长。对方稍晚进了另一间检查室,用的时间比较短。自己检查完出来时,对方已经离开了。陪诊的夫人说,对方听到叫号叫我的名字后,主动与她搭话。原来是黄冈老家的一位堂弟,快20年没见面,彼此都不敢认了。这位堂弟有没有与那位感染新冠肺炎的教授接触不得而知,当时又没有留下电话,后来情况是不是问一声“你还好吧”就能听到“我还好”也不得而知!人生变与不变,皆在弹指之间。

按小葛医生的约定,元月17日上午10点半,由夫人陪同去协和医院六楼眼科,前面正常挂的号快看完时,小葛医生赶过来,看到我们后,第一句就说:你们怎么没戴口罩?听她说这话时,我们还有些不在意,只是碍于情面才表示,忘记了,下次来一定戴上!浑然不觉,这是武汉战“疫”初期,自己直接获得的预警信息!小葛医生陪着我们看完眼科专家门诊,又领着我们到旁边的小楼里做核磁共振。隔了一天,19号再来,拿到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再次由小葛医生陪着去看眼科专家门诊。见我和夫人都戴了口罩,小葛医生很灿烂地笑着说,蛮好嘛!这一次,眼科的姜教授说,要住院做个小手术。我都同意了,他又将话收回去,改为年后再说。元月20日上午,我去市中医医院继续看眼科,在候诊室等着扎针灸时,眼科张主任不停地问前来就诊的男男女女,为什么不戴口罩?也许说得太多,她忽然冲着我,你还没开始扎针,就怕成这种样子!张主任笑话我看着她给旁边的人扎针灸,嘴角眼角在不由自主地抽搐。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自己从小就怕,那么长的银针,要一直扎到身子里,感觉有点吓人。张主任笑一笑,转头又问旁边一位也是扎针灸的女子为何不戴口罩。与协和医院的葛医生明显不同,张主任说话口吻颇为严厉。女子回答说,看着别人戴口罩,都觉得心烦。也是之前听了小葛医生说话后,心里认真想过,自己在一旁忍不住说,别人戴口罩,是对你的尊重,你戴口罩,是对别人的尊重。

(摘自《如果来日方长》,刘醒龙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后记:关于《暖夏》

□王松



插队时当然已无法相比。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感觉,开始的兴奋过去之后,在这里一点一点勾起的,却都是当年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对那段经历并没有“怀念”或“眷恋”。这让我有些茫然。我本来想的是,这次挂职之后,也许会写一部关于这个地方的长篇小说。可这时再想,我写什么呢?又有什么可写呢?

三年后,我就带着这样的茫然和困惑回来了。

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次的挂职经历对我来说并没这样简单。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为后来的这部《暖夏》埋下了种子。

这以后,又有一个关键性的契机。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国作协一个创作报告文学的任务,题材是关于“脱贫攻坚”的。由于我曾曾在江西的赣南地区深入生活很长时间,这次,就由我来写赣南。也就是这次重回赣南,对《暖夏》起了关键作用。一天,《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先生电话我说,你曾在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现在又要为这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去江西赣南采访,何不把这两个经历放到一起,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这话一点点醒了我。接着,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先生知道了我有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想

法,也立刻来电话,建议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方就放在这两个地方——天津的宁河和江西的赣南。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创作前的兴奋状态了。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编故事是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编不好故事的小说家,算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说家这里姑且不论,至少写出的小说不会好看。

这部《暖夏》的故事很快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人物,如同盖房子,四梁八柱都齐了,甚至连如何为这房子“创槽”也有了具体想法。可准备好这一切,却迟迟没动笔。没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或者说有因果关系。首先,我总感觉这个想好的故事过于有“质感”。故事有质感本来是好事,但不能过,一过分量就太“重”了。这也导致了第二个原因: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是这个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刺激得让我更兴奋。如果没有这种兴奋,也就不会有写这个故事的欲望。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一下起了“飞智”。

飞智和灵感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比灵感更“灵”,是一种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规”的想法。当然,我这一次起的飞智与“犯规”无关。当初在宁河的文旅局——当时还叫“文广局”——挂职时,就住在办公室。每天下班也写东西。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发现,一到傍晚,窗外总是敲打锣鼓笙管唢呐的很热闹。一天晚上,我无意中朝窗外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办公室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边有一个小广场,这热闹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广场传来的。原来是一群——还不光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正翩翩起舞地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楼来到这小广场。一看才发现,果

然很有趣。扭秧歌一般是为庆祝什么的,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这些人扭秧歌不是,他们就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焦仲卿和刘兰芝,有冯素珍和李兆廷,有杜丽娘和柳梦梅,还有许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红挂绿描眉打脸地装扮起来,行头也很漂亮。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这伙吹打弹拉的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着写东西了,吃过晚饭,先下楼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后来渐渐发现,还不仅是秧歌,公园的湖心亭里,也经常有人唱评戏。这一带的人都酷爱评戏,爱听,也爱唱,所以号称评剧之乡。挂职这三年,我几乎是在窗外的秧歌和评戏的演唱声中度过的。

起了这个“飞智”,我才意识到,去宁河挂职这三年,真正的意义要显现了。

此时,再想这个故事,不仅变得轻盈了,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包括故事的色彩也都有了变化。此前,这些人物就像北方冬天的树木,是铅灰色的,这时一下都鲜艳起来,就如同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似乎也在空中变幻着,一点点升腾起来。我觉得,我在保留了质感的同时,终于抽去了它的重量。

这确实很难,但我做到了。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尽管我经过努力,终于让这部小说的故事“飞”起来了,但也不能飞得太高。让故事飞翔,当然比贴着地面好,从几何学的角度讲,贴在地面只是两维空间,而飞翔起来则是三维空间,仅从维度说,也会为人物的活动和故事的演绎提供更广阔也更具有自由的广阔场域。但是,如果让它飞得过高,到了空气稀薄的“平流层”,无论人物和故事再怎么演绎也就都没意义了。不光没意义,也不可信了。

由此可见,这件事也不能过,过犹不及。